

制度设计与民主发展

——基于91个第三波民主国家的
定量定性混合分析

祁玲玲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出版得到江苏省一级重点学科（政治学）学科建设资金的资助

制度设计与民主发展

——基于91个第三波民主国家的
定量定性混合分析

祁玲玲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度设计与民主发展：基于 91 个第三波民主国家的定量定性混合分析 /

祁玲玲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3

ISBN 978 - 7 - 5203 - 0164 - 0

I. ①制… II. ①祁… III. ①政治制度—研究②民主—研究 IV. ①D034
②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401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75
插 页 2
字 数 275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民主制度设计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1)
一 民主化理论、比较制度主义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2)
二 研究问题:权力分享制度与第三波民主政治发展	(10)
三 定性定量混合法(Nested Analysis):方法论的折中	(18)
四 各章内容	(23)
第二章 权力分享制度与民主发展的理论考量	(25)
一 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	(25)
二 权力分享与集中视角下的民主制度安排	(29)
三 理论演绎:权力分享制度与民主发展	(38)
四 本章小结	(53)
第三章 第三波民主国家权力分享机制的量化展示	(55)
一 “第三波民主”:案例选择以及分析单位	(55)
二 量化权力分享的制度机制	(64)
三 分权机制的定量展示	(73)
四 本章小结	(93)
第四章 权力分享机制与第三波民主发展	(95)
一 理论假设:权力分享制度与民主发展	(95)
二 研究设计:因变量、自变量与模型	(98)
三 模型讨论	(103)
四 本章小结	(114)

第五章 权力分享机制与民主满意度 (116)

一 权力分享制度与民主满意度:文献梳理 (117)

二 权力分享制度与民主满意度:因果关系 (119)

三 因变量:民主的满意度 (126)

四 制度与民主满意度的多层级分析 (132)

五 分析与讨论 (138)

六 本章小结 (142)

第六章 权力分享制度的影响机制:贝宁与肯尼亚的对比分析 (146)

一 利普曼分析框架中的案例选择 (146)

二 案例的选择:贝宁与肯尼亚 (148)

三 肯尼亚民主:权力分享机制的缺失 (154)

四 贝宁民主:权力分享制度的力量 (162)

五 肯尼亚的政治改革 (168)

六 本章小结 (173)

第七章 民主发展与制度设计无涉的国家:蒙古国与泰国 (175)

一 案例的选择:为什么选蒙古国与泰国? (176)

二 政治精英与蒙古的民主 (181)

三 政治妥协缺失的泰国民主 (197)

四 本章小结 (208)

第八章 制度设计与民主发展 (210)

一 民主制度设计中的权力分享:重要性与局限性 (211)

二 混合分析法之必要 (214)

三 对第三波民主国家比较制度研究的启示 (216)

四 结语:第三波民主发展及其未来 (219)

参考文献	(223)
一 中文文献	(223)
二 英文文献	(223)
三 其他	(257)
后记	(258)

第一章

民主制度设计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民主方法就是为实现共同福利作出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其方式是使人民通过选举选出一些人，让他们集合在一起来执行它的意志，决定重大问题。

约瑟夫·熊彼特（1976：250）

对第三波民主转型国家现有的民主制度设计展开系统研究的兴趣至少源自以下几个事实。第一，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以来的第三波世界民主化浪潮高歌猛进，已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当然我们暂且不论这一声势浩大的制度变迁是以何种方式抑或是否真正孕育了各国良性的政治运作。第二，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制度主义研究业已通过大量的实证挖掘颇为有力地指出，政治制度的安排是塑造民主或非民主体制政治运作的重要动因，制度设计的总体架构与各个细节都被认为是分析各国国内政治运作不可或缺的因素。第三，目前制度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成熟民主国家，而且相关文献日趋深入精细化。比较而言，在过去40年中，转型且巩固下来的新兴民主国家制度安排的政治后果，尤其是相关的系统性大样本的比较研究，目前是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相对缺失的部分。以上现状基本形成了本书研究的背景。

就目前制度主义的相关文献来看，制度主义研究主要采取两大理论框架：议会制/总统制（Parliamentary vs. Presidential System）理论框架以及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的多数/共识民主（Majoritarian vs. Consensus

Democracy) 理论框架。^① 关于总统制劣势与危险性的讨论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② 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得到了长足的拓展, 方兴未艾, 相关文献仍不断涌现。然而, 针对利普哈特所提炼出的多数/共识民主的维度来考察民主制度设计的机理及其后果的研究却相对局限: 因为利普哈特本人著作所分析的三十六国民主主要集中在西方成熟的民主国家, 其他学者对于这一框架在新兴转型民主国家的拓展分析相对碎片化, 并主要以案例分析主导。因此很自然地, 制度主义的比较研究者已经开始致力于将这一多数/共识民主框架扩展至第三波新兴民主国家的跨国研究中, 着重探究这一维度所指向的制度设计中的分权程度如何复杂地影响这些国家的民主发展进程。本书的研究正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中展开, 沿袭制度主义分析套路, 提炼利普哈特的多数/民主理论框架中的核心变量, 对 1974 年以来所有的第三波民主转型国家的制度设计的诸多变量展开实证性研究, 目标指向一个核心问题: 在非西方民主国家的环境中, 共识民主作为制度设计上的权力导向型民主, 同样也是“更宽容更温和”(Kinder and Gentler)^③ 的民主吗?

一 民主化理论、比较制度主义与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纵观全球, 当前诸多国家国内政局跌宕起伏: 北非三国(埃及、利

① Lijphart, Arend. 1999. *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ijphart, Arend. 2012. *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Also see Lijphart, Arend. 1999. "Australian Democracy: Modifying Majoritarianism?" in *Conference on Represent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50 Years of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in the Senate*. Canberra, Australia, pp. 313-326; Lijphart, Arend. 2002. "Negotiation Democracy versus Consensus Democracy: Parallel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1 (1): 107-111.

② Linz, Juan. 1990. "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 (1): 51-69; Mainwaring, Scott. 1993. "Presidentialism, Multipartism, and Democracy: the Difficult Combin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6 (2): 198-228.

③ Lijphart, Arend. 1999. *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 293; Also see Lijphart, Arend. 2012. *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 274.

比亚和突尼斯)威权体制分崩离析、新建的民主体制却遭遇难产;乌克兰貌似已经迈向巩固的民主体制,却在纷繁的民族分裂冲击中经历着领土割裂、战火纷飞的尴尬;泰国旷日持久的集会抗议直接瓦解着选举政治;伊拉克风雨飘摇的联邦民主制没有丝毫填补独裁制戛然而止之后政治权力运作真空的迹象;查韦斯生前给委内瑞拉运行了近半个世纪的稳定民主制度带来的冲击依旧激烈,该国如今已经面临国家破产的危险境地;罗伯特·穆加贝让整个津巴布韦共和国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些频繁出现在国际政治讨论论题中各国政治的变迁动态,尽管在地理空间上远隔、貌似互不相关,但实际上都可以被归纳到一个相对宏观而宽泛的概念之下——第三波民主化。这一肇始于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里斯本的军事政变、被归纳为席卷全球“第三波世界民主化浪潮”^①被视为“二战”以来的最具影响力的政治现象,其威力依然强大。^②

南欧专制在20世纪70年代的终结首先开启了这一浪潮;而后拉丁美洲迅速卷入,接二连三掀翻了颠覆之前民主体制的军人统治,迎来民主的回归;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共产主义在欧亚大陆崩塌,一大串中东欧国家跳上了民主的列车;非洲与亚洲在这场民主化的浪潮中亦无法置身事外,相当数量的非亚国家于20世纪90年代后相继加入民主俱乐部。根据“自由之家”2016年报告,2015年全球一共有86个国家(44%)现在被列为自由民主国家,59个国家(30%)属于部分自由民主国家,还有50个国家(26%)仍不自由民主。按人口来计算,大约有40%的人口生活在民主体制之下,24%为部分民主体制以及36%生活于非民主体制。尽管在过去的九年中全球的民主进步状况有所退步,但并未影响当前世界整体政治图景,全球超过了2/3的

① Huntington, Samuel P. 1993.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② 有学者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主化转型现象已经不再能被归纳到“第三波”的概念之下,而被视为“第四波”(例如,McFaul, Michael. 2002. “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Noncooperative Transitions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World Politics* 54 (2): 212–244; Also see Tusalem, Rollin. 2007. “A Boon or a Bane? The Role of Civil Society in Third-and Fourth-Wave Democracie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8 (3): 361–386.)但,笔者更为认同学术界的主流意见,将中东欧以及最近的北非政治变迁以及仍视为第三波的一部分。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新近的民主转型现象与之前的三十多年的政治变迁有本质的断裂,即便是有民主退潮的现象,视为第三波的回潮似乎也似乎不无道理。

国家已经进入民主选举的阶段。^① 过去的若干年中民主体制的大规模扩张顺理成章地滋生了关于自由式民主的全球性政治乐观主义。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的言论^②在二十多年后似乎仍大有市场。然而，随着大批国家政治转型的到来，一系列关于民主转型后制度的稳定性以及民主体制能否得以巩固的问题相伴而生。实际上，当前在埃及、伊拉克、乌克兰、泰国等国出现的动荡并非民主巩固的新问题。伴随着民主转型浪潮的到来，我们早就能观察到一大批国家在转型之后即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表征为“委托式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③“非自由式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④甚至“脱轨的民主”（Derailed Democracy）^⑤等现象与概念迅速进入了比较政治学者的视野。纵观目前全球民主发展的趋势，已经有相当一批比较政治学者开始担忧起全球民主衰退（Democracy in Decline）的问题。^⑥虽然民主选举已经成为这些转型国家的制度化实践，但是其政治发展与体制稳定性显然是这批新兴民主国家需要面对的首当其冲的问题。

“二战”后政治经济剧烈转型的复杂过程促使比较政治学者展开对新兴民主国家发展与巩固的决定因素的探究。主流的民主化理论文献主要有以下几种。

1. 结构主义解释（The Structural Approach）

此类文献侧重于探索国内的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结构性变化如何孕育和启动了民主化进程，通常被纳入“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

① See Freedom House Report 2016, “Anxious Dictators, Wavering Democracies: Global Freedom under Pressure.” Accessed at: 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FH_FITW_Report_2016.pdf, retrieved on March 16, 2016.

② Fukayama, Francis.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Hamish Hamilton.

③ O'Donnell, Guillermo. 1994. “Delegative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5 (1): 55–69.

④ Zakaria, Fareed. 1997. “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76 (6): 22–43.

⑤ Fish, M. Steven. 2005. *Democracy Derailed in Russia: The Failure of Open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⑥ Diamond, Larry and Marc F. Plattner. 2015. *Democracy in Declin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lso see Diamond,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2015. *Authoritarianism Goes Global: Challenge to Democr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相关的讨论还呈现在《华盛顿邮报》特别讨论版: <http://www.ned.org/democracy-in-retreat-as-authoritarianism-goes-global/>, Retrieved on June 6, 2016.

的范畴。^① 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观点直截了当：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的结构型变迁，就此催生了广泛的对于民主的诉求，这将直接影响到一国的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进程。^②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诸多经验性研究文献支撑了李普赛特的研究理论，直到 1973 年阿根廷学者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A. O'Donnell）基于南美政治的经验，结合依附理论提出了“官僚威权主义模式”（The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Model）。^③ 该理论挑战了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命题，认为一国依附性的经济增长模式往往依靠并敦促威权官僚体制的加强，而不是催生民主化过程。尽管挑战了现代化理论，但奥唐奈的理论框架仍然是结构主义的，不过他把变量的分析从国内的结构性转向了国际视野。当然，现代化理论作为最早关于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理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一直在被讨论、被质疑和被证明着。随着一些具有争议的地区及国家的发展模式逐渐引起学者们的注意，现代化理论的例外案例也逐渐导向了诸如自然资源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讨论，文献呈现最为频繁的主题就是石油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④ 不过随着经验数据的拓展和全面考察，不断精确化的研究以及整体趋势上大体印证着该理论的基本结论。^⑤ 当然，关于民主转型以及政治变迁的制度主义的研究并不仅

①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59.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1): 69 - 106; Przeworski, Adam and Fernando Limongi. 1997.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Facts." *World Politics* 49 (2): 155 - 83; Boix, Carles and Susan C. Stokes. 2003. "Endogenous Democratization." *World Politics* 55 (4): 517 - 549.

②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59.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1): 69 - 106.

③ O'Donnell, Guillermo. 1973.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④ Ross, Michael L. 2001. "Does Oil Hinder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53: 325 - 361; Ulfelder, Jay. 2007. "Natural Resource Wealth and the Survival of Autocrac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0 (8): 995 - 1018; Oskarsson, Sven and Eric Ottosen. 2010. "Does Oil Still Hinder Democrac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6 (6): 1067 - 1083; Dunning, Thad. 2008. *Crude Democracy: Natural Resource Wealth and Political Regim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⑤ e. g. Przeworski, Adam. 1991.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zeworski, Adam and Fernando Limongi. 1997.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Facts." *World Politics* 49 (2): 155 - 1083; Boix, Carles and Susan C. Stokes. 2003. "Endogenous Democratization." *World Politics* 55 (4): 517 - 549; Espstein, David L., Robert Bates, Jack Goldstone, Ida Kristensen and Sharyn O'Halloran. 2006.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0 (3): 551 - 569.

仅局限于现代化理论,包括巴林顿·摩尔以及他的学生斯考切波等对革命的讨论在内,都可以被列入这一范畴;^①作为相对传统的研究路径,在方法论上这些早年的著作鲜有采取大样本实证检验的思路。^②

2. 公民文化理论 (The Civic Cultural Approach)

这一脉的文献具有显著的方法论特征,往往基于跨国比较的大样本问卷的数据基础,考察公民的政治态度与民主体制运作之间的关系。^③尽管文化与民主运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调研数据分析的手段一直受方法论学者的诟病,^④但这一脉研究在民主化理论中一直占据着一席之地,尤其是对民主巩固与民主稳定的研究。从“二战”后公民文化研究的演进来看,最为经典的当然是追溯到阿尔蒙德与维巴的经典著作,他们所讨论的公民文化与民主稳定之间的关系以及所采用跨国比较研究的方法至今仍然延续并被继续发扬光大。不过,1994年帕特南突破性的著作《让民主运作起来》无论是从其混合研究方法的角度还是关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讨论内容都将之前传统的公民文化研究推入了新的阶段,成为分水岭式的著作。^⑤自此,社会资本这个属于公民文化范畴的概念成为考察民主运作不可或缺的维度。此间,英格尔哈特系列调研数据基础上的著作逐渐把

① 对于革命理论的演进,详见 Goldstone, Jack A. 2001. "Towards a Fourth Generation of Revolutionary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4: 139 - 189 对各个理论流派的详细梳理。

②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张东东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美]西达·斯考克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与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Also see the English Version: Moore, Barrington Jr. 1967.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Skocpol, Theda.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③ 这其中最早也是最著名的研究是: Almond, Gabriel A. and Sidney Verba.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④ e. g. Elkins, David and Richard E. G. Simeon. 1979. "A Cause in Search of its Effect, or What does Political Culture Explain?" *Comparative Politics* 11 (2): 127 - 145; Also see Seligson, Mitchell. 2002. "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 or the Renaissance of the Ecological Fallacy." *Comparative Politics* 34 (3): 273 - 292.

⑤ Putnam, Robert D., Robert Leonardi, and Rafaella Y. Nanetti.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公民文化的比较研究推向了全球范围。^① 比较文化研究者继而将地区文化元素与民主化结合, 得益于涌现的系列性地区性政治价值观晴雨表 (Regional Barometers), 学者们开始探索比较文化的实证效应, 例如, 儒家文化与东亚民主;^② 非洲的公民文化与民主化;^③ 苏东国家^④ 以及拉丁美洲^⑤ 各个板块的独特文化效应等。公民文化研究从理论框架上来讲, 与现代化理论有相当的交叉, 现代化的进程往往被视为公民政治态度变迁的深层动因, 英格尔哈特的代表性著作《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就明确指出是矫正后的现代化理论。^⑥ 尽管对于公民文化研究批判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 但随着比较数据的不断采集与堆积, 可以预见, 各式各样的关于公民文化的实证性文章将继续出现在政治学期刊中。

3. 政治代理人理论 (The Political Agency Theory)

在对结构主义解释所暗含的“决定主义论”(Determinism)的批判中, 民主理论学者逐渐考虑到把具有能动性的政治行动者纳入了分析范

① 英格尔哈特的系列著作包括: Inglehart, Ronald. 1977.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New Heave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nglehart, Ronald. 1989.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New Heave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nglehart, Ronald.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New Heave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nglehart, Ronald and Christian Welzel. 2005.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② e. g. Shin, Doh C. 1999. *Mass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Democratizing Kore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in, Doh Chull. 2011. *Confuc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East As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u, Yunhan and Larry Diamond. 2010.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in, Doh C. and Jason Wells. 2005. "Is Democracy the Only Game in Town?" *Journal of Democracy* 16 (2): 88 - 101.

③ Bratton, Michael and Robert Mattes. 2001.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Africa: Intrinsic or Instrumental?"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1: 447 - 474; Mattes, Robert and Michael Bratton. 2007. "Learning about Democracy in Africa: Awareness, Performance, and Experi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1 (1): 192 - 217.

④ e. g. Rose, Richard. 2007. "Learning to Support New Regimes in Europe." *Journal of Democracy* 18 (3): 111 - 125.

⑤ e. g. Seligson, Mitchell. A. 2000. "Toward a Model of Democratic Stability: Political Culture in Central America." *Estudios Interdisciplinarios de America Latinayel Carib* 11 (2): 5 - 29.

⑥ [美]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 43 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 严挺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Also see Inglehart, Ronald and Christian Welzel. 2004.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畴。从逻辑上讲,结构主义的解释遭遇的最大的困难在于,假以既定的社会发展结构,我们应该观察到确定性的政治变迁后果;然而,第三波民主化进程的复杂局面显然无法很好地印证这一预测。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将很多学者推向对政治转型的具体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参与行动的政治代理人行为的考察。简而言之,行动者的主观选择是制约民主政治变迁过程中无法忽视的变量。^① 政治精英、领导人的战略性选择等元素被呈现在体制变迁的分析当中。^② 这一脉的理论当然并非单打独斗,在民主化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与结构主义以及本书着重讨论的新制度主义密切相连。究其原因,因为在考察政治行动者的行为选择时,其所面临的结构性因素以及制度性框架是塑造政治精英等战略选择不能回避的背景。因此,在嵌入政治代理人元素时,我们往往看到的是一个综合而全面的民主化理论。

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民主制度的框架在诸多转型国家被搭构起来并进入实质性实践阶段,在结构性、文化元素被反复论证却无法令人满意地全面解读民主化进程后,学者开始思索政治制度本身的独立作用。^③ 早在20世纪60年代,亨廷顿等实际上就开启了制度主义研究的先河。^④ 在此后的20多年里,结构主义的探索显然仍旧彰显着相当的活力以及可以不断

① O'Donnell, Guillermo, Phillippe C. Schmitter and Lau Whitehead. 1986.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Vol. 4: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lso see Linz, Juan J and Alfred C.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② 这其中有大量关于政治精英的案例讨论,参见 Goldstone, Jack A. 2001. "Towards a Fourth Generation of Revolutionary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4: 139 - 189, 150. Also see Selbin, Eric. 1997. "Revolution in the Real World: Bring Agency Back in." in John Foran. 1997. *Theorizing Revolutions*. London: Routledge. 代表性的著作包括 Goldstone, Jack A. 1991. *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inz, Juan J and Alfred C.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Selbin, Eric. 1998. *Modern Latin American Revolution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③ March, James and Johan Olsen. 1984.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8 (3): 734 - 749; Hall, Peter and Rosemary C. R. Taylor. 1996.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44 (5): 936 - 957.

④ Huntington, Samuel P. 1968. *Political Orders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同时参见 Huntington, Samuel P. 1981.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最早的版本是在1957年。

推进挖掘的空间,这一分析框架也深刻影响了民主化理论的演进,包括我们之前提及的巴林顿·摩尔等学者的著作。不久,出于对过度徘徊于结构主义解释以及文化元素争论现状的平衡,学者们又开始重拾政治制度这个变量。新制度主义的民主理论者的理念是直截了当的:撇开经济社会结构、文化因素,制度本身对民主运作具有塑造作用,是民主发展的动力之一,抑或民主举步维艰的阻力来源。简言之,他们主要致力于挖掘政治制度如何影响从威权体制衰落到民主转型以及此后如何巩固等一系列民主化进程所涉及的重要环节。新制度主义自兴起至今已经过去不短的时间,但仍然为当前政治学研究的主流路径,尤其在当前势不可当的理性选择主义结合之后,更是受到政治学者们的热捧,在顶级的政治学期刊上此类文章层出不穷。^①

当然,理性制度主义引领下的行为主义比较研究在过去的若干年主要关注点是成熟的西方民主国家,这也是由这些国家的体制发展现状决定的。西方民主体制在运行多年后,政治体制已经进入相对制度化的阶段,制度化的规则带来的是更为稳定的制度性激励,从而塑造了在此规则下的行动者的偏好,并深入影响他们长期的战略性行为选择。总之,稳定的政治制度对于政治发展方方面面的影响无处不在,是政治行为体行动背后“看得见的手”。因此,基于对成熟的西方民主国家中已经稳定下来的制度研究文献和著作层出不穷也不足为奇。然而,对于比较政治学者来说,制度主义分析来日方长,大批兴起的新兴民主国家挑战着诸多早先相对成熟的研究结论在非西方国家的适用性,呼唤着制度主义比较研究向这些国家的延伸。诚然,刚刚越过民主转型门槛的民主俱乐部新成员们还远不具有西方民主国家的制度稳定性,但是大多数第三波民主国家都已经运行超过二三十年,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民主体制被军人政权颠覆后体制的反复不同,它们都普遍经历了超过四五轮以上的民主选举实践,能够大体维持在民主的基本运行框架下,^②因此民主制度设计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势必存在。与此同时,第三波民主转型国家当前的民主发展水平差异

① Remmer, Karen L. 1997. "Theoretical Decay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The Resurgence of Institution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50 (1): 34 - 61; Lichbach, Mark I. 2003. *Is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ll of Social Scienc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② 根据“自由之家”的年度报告,近几年全球范围的民主巩固遭遇了相对的瓶颈,也陆续出现了崩溃的民主,比起20世纪90年代的情形有较大的差别。

巨大，比较制度主义者也纷纷揣度这其中是否存在制度设计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激发了比较制度主义研究者对于制度设计之于后转型时代政治发展后果的兴趣。

总而言之，当前呈现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趋势之一就是向着新兴民主国家的全面延伸。本书的研究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做出的努力：考察所有第三波民主国家的制度设计的权力分享程度如何影响民主发展进程。

二 研究问题：权力分享制度与第三波民主政治发展

对“民主”展开词源学上的探究以及试图厘清层出不穷的关于民主规范性内涵的讨论均不是本书的目的。本书探讨当下民主政体制度设计问题，民主定义当然属于熊彼特式的程序性范畴。但是，无论我们是对民主作直接参与性定义还是作代议程序性定义，还是诠释为“民有、民享、民治”中的某一项，都离不开“人民”这个概念，民主终究是“人民”做主的体制。只是“人民”同样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概念，这里我们对民主运行进行经验研究，姑且暂时撇开卢梭所持的不可分割的公意的主张，^①以计算原则来进行理解，人民可以意指“每一个人”，也可以指代绝对多数原则抑或有限多数原则下的“大多数人”。^②无论人民是指代哪一种，也无论是直接民主或者代议制民主，在民主运行中马上就会面临这一问题：既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意志以及权利诉求，如果“人民”之间互相不同意怎么办？代表人民进行统治的政府又将代表谁的利益呢？现代代议制民主的不同民主制度的设计模式对此问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③在制度设计上权力相对集中的民主，往往以多数选举规则、两党制

① [法]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35—40 页；同时参见 [美] 萨托利《民主新论》，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6—27 页。

② [美] 萨托利：《民主新论》，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5 页。

③ Lijphart, Arend. 1984. *Democracies: Patterns of Majoritarian and Consensus Government in Twenty-one Countries*.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ijphart, Arend, 2012. *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1-2; Also see Powell, G. Bringham. 2000. *Elections as Instruments of Democracy: Majoritarian and Proportional Visions*.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以及一个占主动地位的行政部门为特征，从而形成一个相对有效且可识别的人民的“大多数”进行政府运作；而在制度设计上权力相对分散、更加呈现为权力分享格局的民主，往往以比例代表制、多党制以及平衡的立法—行政关系为特征，往往在政府运行过程中更加包容广泛的利益。^①前者被称为“多数民主”（Majoritarian Democracy）；后者为“共识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利普哈特在他广为流传的关于36个民主国家的制度主义研究中表明，与权力的制度设计相对集中的“多数民主”相比，表现为权力分享特质的“共识民主”是“更宽容更温和”（Kinder and Gentler）的民主模式。^②他的团队利用最新数据后的研究仍然支撑了这一结论。^③

利普哈特的理论框架大大拓宽了比较制度主义研究者的视野，研究者已经将此理论框架运用到宽泛的民主体制的比较研究中，包括对各国制度设计的权力分享机制发展趋势的经验型探究，主要是对这一维度的描述性解释。利用相对完整的利普哈特的框架进行研究的仍然出现在西方成熟民主国家。例如，新近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各国从1945年到2010年的全面检测，^④或者是对一国的全面深入挖掘。例如，英国的民主制度权力分享维

① Lijphart, Arend. 2012. *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9 – 30; Also see Powell, G. Bringham. 2000. *Elections as Instruments of Democracy: Majoritarian and Proportional Visions*.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Norris, Pippa. 2008. *Driving Democracy: Do Power-sharing Institutes Wor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② Lijphart, Arend. 1999. *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 275.

③ Lijphart, Arend. 2012. *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 274.

④ Vatter, Adrain, Mathew Flinders and Julian Bernauer. 2014. “A Global Trend toward Democratic Convergence? A Lijphartian Analysis of Advanced Democrac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7 (6): 903 – 929; Vatter, Adrian. and Julian Bernauer. 2009. “The Missing Dimension of Democracy: Institutional Patterns in 25 EU Member States Between 1997 and 2006.”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10 (3): 335 – 359.